

卷首语

乐黛云

[法]阿兰·李比雄

恩贝托·埃柯近著《完美语言之求索》在学术界引起了巨大反响,因为它提出了一个众所关切的问题:一方面,欧洲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一种“能够弥合其语言裂变的共同语言”;另一方面,欧洲又必须忠实于其作为拥有种种不同语言的一个大洲的使命,“因为这些语言中的每一种,哪怕是最边缘的,依旧是某个独特族群表达其特点的媒介,是上千年传统的见证和载体”。在对一种共同语言的需求与捍卫语言遗产的需求之间可以调和吗?未来发展的趋势如何?这是一个全球遭遇的问题。本刊率先登载了这部新著的《结语》,从中可以看到对这一问题的极其精到的分析。

《杜威实用主义与儒学的对话》扼要记录了2002年4月在美国波士顿召开的一次高层学术研讨会。会议的主要发言人有儒学造诣很深的哈佛大学教授杜维明,有杜威研究重镇美国杜威研究中心的主任拉里·希克曼,还有十几位对杜威和儒学各有所长的专家学者。他们聚在一起,为的是讨论夏威夷大学安乐哲教授有关杜威实用主义与儒学会通的最新学术成果(部分内容见本刊第七辑《儒家思想与实用主义》、第八辑《儒家民主主义》)。会议经过多次反复辩难,不乏尖锐的质疑和驳论,但主要倾向是充分肯定了安乐哲教授学术工作的重大意义,认为他“打了解读语言的锁”,“启动了儒家思想生机勃勃的资源”。有的学者还推而广之,指出儒家社会和“西方后现代困境”关系最为紧密的若干方面,进一步开启了未来研究的方向。这篇经过高手整理综合的记录不仅让我们见识了思想如何在辩难中深化,而且对我们如何提高会议质量也颇有启发。

后殖民主义著名理论家霍米·巴巴首次来到中国,在清华大学作了题为《全球性的尺度》的讲演,着重论述了第三世界国家和少数族裔批评话语的建构问题,和中国学者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全球性后殖民语境下的跨文化对话》一文为这次讨论留下了真实的记录。

本期值得特别关注的是杨慧林教授的文章《读解“圣言”》:从扎实的材料出发,将神学的方法引入意义的解释,为解释学开拓出一片开阔的视野;本刊首发的欧文·白璧德与吴宓的六封书信则为新人文主义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材料;数篇有关中外文化之间的文学对话也都很有新意。